

# 史学研究网

—— 史学理论、史学史、海外中国学史研究

| 首页 | 学术信息 | 史学理论研究 | **史学史研究** | 海外中国学史研究 | 海外看中国 | 书窗、书评 | 报道、随笔 | 等等

▶ 您现在的位置： 史学研究网 >> 史学史研究 >> 中国史学史 >> [专题] 乔治忠 >> 正文

今天是： 2009

☞ 乔治忠：中国历史考据学的发展

热

## 乔治忠：中国历史考据学的发展

[ 作者：乔治忠 转贴自：文献与史学网 2009-3-17 点击数：242 文章录入：teadmin ]

### 中国历史考据学的发展

乔治忠

301

载《从考古到史学研究之路——尹达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

在历史学内，历史考据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讨论中，都应当从理论层次上对历史考据问题予以充分的关注和总结。中国历史学具有自异常兴旺的特点，因此总结中国历史考据学的发展，是研讨历史学方法论及思维路径的。中国历史考据学的发展，已经作出不少研究，如陈垣先生从文献学方法上的论述、顾颉刚角度的总结，均为精辟的开拓性创见，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本文拟在学术界已有研究出一些新的分析和新的总结，以供史界同仁商榷与讨论。

#### 一、“历史考据学”的概念及其内容

凡研讨用一个概念表达的学术对象，必须确切地界定其内涵和外延，否则可能致使无的放矢，论者浑沌，读者迷茫。这种有意无意使论题范围模糊不清，浑沌说去的现象，并不少见，亟应克服。因此，这里有必要首先界定所要讨论的问题。

考据，其成熟的形式以及规范的方法，是要条举证据，以论断研究对象的真实状况。“学”，则须在学界出现了数量较多、影响广泛的专门著述，实际上形成一种相对独立且具备一定程度的关于历史考据的学术理念。历史考据学就是在历史学之内，以历史考据专门著述为依托，并且形成特有学术理念乃至专门理论的分支学科。中国的历史考据，经过的考订，而尚不足以言“学”的长时期积累，逐步蔚成学者广泛认可和采纳的治学方向。合修史著书的附属地位中相对地独立出来。在中国，这个过程是相当漫长的。考察这个要从清理早期零散的历史考订开始，揭示其如何逐步演化为一类专门的学术，并且怎样完善。

历史考据就其内容而言，可以大致分为关于史实的考证和关于历史文献的考证，二系。

所谓“史实的考证”，包括核查以断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上社会制度文化等等一切历史的实际状况。以上各项均涉及到具体研究对象的时间、地点、具体情况是有是无，例如历史传说中的黄帝、被载入《明史》的李自成军内的重要人物李岩，是否真有其人的问题。

所谓“历史文献的考证”，包括对文字形式的所有史料之形成背景、名义真伪、内等等等的考订判断，如《古文尚书》的真伪、《左传》的作者、《史记》的史料来源、《问题，皆曾经是学界考证、讨论的热点。

史实的考证在一般情况下需要应用历史文献中的资料，因此不仅必须利用历史文献而且在史实考证的进程中也往往需要对相关历史文献进行辨伪或考实，从而说明文献的证李岩其人是否真的存在，要追溯各种历史文献有关记载的源流、变化，特别是最早文可信。对上古史事、礼仪、典制的考证，更无可避免地牵涉相关文献真伪、形成年代、考订。而对历史文献的考证，又必然涉及到相关历史阶段的史事、人物和社会背景，即的可信成果。可见史实的考据与历史文献的考据不是相互孤立的，在比较复杂的历史考据中交错进行，但就考证的具体目的来说，则有理清史实与判别文献的不同。

出土文物、出土文书及古代文化遗址，可以概称之历史遗存，是历史研究的另一类证、鉴定的对象。近代以来在西方学术文化的影响下，形成运用大量特殊技术手段和特日益重要，蔚为大观。考古学其实是历史考据学的延伸，它仍然要应用一般的历史学知的技术手段与特殊的知识，文物与遗址的研究类似于史实的考证，出土文书的辨认与研究考证的性质。

在中国古代，历史考据是伴随经学的考据活动兴起的。旧时经学的考据，很大一部史史实考证或历史文献考证，但也有一部分不属于历史考据，如《诗经》中名物的考释不止于现今历史学一个领域之内，于是有笼统的“考据学”的概念。其实，考据的内容围——文学方面的考据多为文学史范围，哲学方面的考据多为哲学史问题，以此可以类还有“辨伪学”的概念，从辨别真伪的对象来看，有许多书籍虽不属于史籍，但任何伪史的现象，辨伪的研究方法与立说依据也多可归结为历史学的范围。因此，“辨伪学”个组成部分，历史考据是现今各个学科考据性治学活动中的根基和主干。

## 二、从先秦到隋唐五代的历史考据

从先秦到隋唐五代，历史考据活动作为撰著历史专书的附属，经历着方法上、实践迟迟未能获得相对独立的学术地位，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值得注意的问题。对此予以加深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全面认识。

### （一）先秦至西汉时期，历史考据的萌芽与初步发展

中国先秦时期至春秋时代，文化事业有了广泛地发展，历史事实的考述与历史文献发状态。最初，史实的考述尚多出于现实军政活动的直接应用，由于军政活动的某种需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找出历史依据，提出解决方法，这对于历史考据活动的产生和发动力。《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记载：是年（公元前634）齐国伐鲁，大兵压境，鲁国人示来犒劳齐国军队。齐国君主问：我军来伐，鲁人怕不怕？展喜对曰：小人怕，君子则在鲁人没粮食，田地上无青草（四月，青黄不接），依仗什么而不怕？展喜引述历史回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告之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1]又称各国诸侯都说现今齐君桓公的政策，所以我们不作防守的准备。齐君于是退兵。这段故事当然是说明当时先王侯还有一定的限制作用，但作为鲁国展喜而言，他是引据历史，通过考述历史事实来说

《左传》定公四年（前506）记载周天子使刘文公召集十国诸侯会盟于召陵，在排歹

蔡居于卫国之前。卫国使臣详考周代宗族礼仪之制，特别是引据此前晋文公践土之盟时的史实，终于使卫国在此次会盟中仍居蔡国之前。

直到今日，从政治、外交、军事上的现实需要来考查历史，仍然是常常发生的。因的需要往往是推动史实考述的重要因素，历史考据并非仅仅存在于纯学术领域之内。问了现实社会活动的需要来考述历史，如何树立尊重史实的理念。春秋时期，晋国发生赵盾弑君事件，史官董狐于史册记载“赵盾弑其君”。据称孔子曾评论此事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2]这段记载固然表现出如实书写的制约之下实施，但“书法不隐”的“良史”观念已经突破周朝礼制的外壳，有利于史学传统。随后，齐国史官不惧强权、不惜牺牲生命而记载“崔杼弑其君”事件，[3]更胜于史实的理念。这对史学的发展，对历史考据的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论语·子张》记载孔子的学生子贡对史书记述商纣王的罪恶有所怀疑，认为“纣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尽归焉。”[4]显然，将商纣王描述为恶贯满盈是周人但子贡则表现出一种排开政治制约的考据意识，并且不讳言其对历史真相的见解。对传说，是引发历史考据的契机之一。战国时期，这种怀疑精神有所扩展，孟子云：“尽信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流漂杵也！”《书》记载失实，带有一个确认周武王“至仁”、商纣王“至不仁”的前提，其局限性显书，则不如无书”的命题，具有强大的震撼力，给后来的历史文献考据和历史考据提供

除官方之外，儒家是春秋与战国时期最重视记述历史的学派，这与儒家主张“法先王”联系。而主张“法后王”的法家，对历史问题的质疑也具有去伪征实的思想价值。例如墨子都称述尧、舜而所言歧异，尧舜不复生，谁能分清其真伪？认为“无参验而必之者，诬也。”[6]韩非提出了必须经过“参验”的来确定事实，未经参验得以确认，据。这里的“参验”包含以理推测与事物之间对照的方法，其中倡导核定事实的思想，观念相通的。

总之，先秦时期初步产生了考核史事、订正历史文献的意识，但尚未形成充分引用的学术活动，如果对史事有所辨析，大多仅仅靠推理性论断。《吕氏春秋》记述子夏读师三豕涉河”文句，认为其中“三”当为“己”、“豕”当为“亥”，皆形近而讹，应订正为“河”。这被许多著书引为校勘学的事例，但却不是通过不同版本的校对来订误，而是应学知识，通过思考得出的判断，实际仍然是对历史文献的推理性考订。

战国时期频繁激烈的战争，对历史文献不能不造成损坏，春秋、战国时期的兼并战国的历史记录也得不到战胜之国的保护，甚至有意地将其毁弃。待至秦统一六国之后，书籍活动。因此，秦汉之际，历史文献的残缺佚失已经极为严重。西汉兴起，统治者逐渐搜集、文献的残缺则导致许多疑难问题的出现，典籍的搜集、校对与考核工作也随之开经学、史学都出现了一定的考据活动。考据渐渐成为一些学者著书立说过程中应用的辅助对历史史事的考订，至司马迁撰写《史记》，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

司马迁具有考核征实的史学意识，撰入《史记》历史事件，是经过核定或选择的，考据活动略记于《史记》中，如《史记·周本纪》中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迁徙于洛宛列传》中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两千五百余里……今自张骞使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予以实地考察并且与文献、传闻相参照，弄明了许多模糊的说法，更正了不少讹传。大的可信性。《史记》记载的时代起于传说的黄帝，当时相关的文献甚多，司马迁说：“以来皆有年数”然而同类各书的记述出入甚大，“稽其历谱，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7]于是他放弃记载共和行政之前的年月，仅编辑帝王世系的表现出历经考核后的严谨慎重态度。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自称《史记》的撰著乃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这里聚集史料之后的“考之行事”，毫无疑问订过程。

东汉班固著《汉书·艺文志》，采用小注的方式对许多图书的作者、时代作了判定君臣》十篇，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也”，“《天乙》三篇，天乙谓汤，其言非汤

“《黄帝说》四十篇，迂诞，依托”，在刘向、刘歆校订图书的基础上作出判断，有的由，呈现为初级的文献辨伪形式。古文经学家郑玄、文字学家许慎、思想家王充，均有辨，如郑玄对《月令》的考证：“《月令》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也，以《礼》后人因题之名曰“礼记，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8]考辩的《月令》考订的证据则根于历史知识。经学家马融对当时流行的《尚书》中《泰誓》篇的辨伪，考据的精湛程度：

《泰誓》后得，案其文似若浅露。又云：“八百诸侯不召自来，不期同时，不及“火复于上，至于王屋，流为雕。五至，以穀俱来，举火”。神怪，得无在子所

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语》引《泰誓》曰：“朕梦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杀伐用”；《孙卿》引《泰誓》曰：“独夫受”；《礼记》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今文《泰誓》皆无此语。吾见书传多矣，所引《泰誓》者甚多，弗复悉记，略举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9]

这项辨伪考证，逻辑严密，理据充足，首先从文句浅陋、又语神怪上指出其可疑，在《春秋》、《孟子》、《国语》、《荀子》、《礼记》等先秦典籍，以多重证据判断该《泰誓》在考据方法上达到很高的水平，具备了历史考据的较成熟的形态。但两汉时期，似这样史考证为数甚少，远未形成治学气氛，也没有专门的历史考据著述出现。无论司马迁、马融，其进行考据皆是为别的著述活动作辅助工作，具有随机、散碎的特点，没把历史考据任务和学术目标。总体来看，截至两汉，考据方法在先秦时期的基础上得到初步发展，历史考据学的产生。

## （二）魏晋六朝时期在历史考据上的探索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史书多样化发展的时期，私家撰史，特别是私家撰写近世史风气。史书种类剧增，形式多样，风格各异，学术质量相差悬殊，对史事的记载相互歧异，核与梳理的空间。历史考据在学人多方向探求治学路径的气氛下，出现显著的跨越性进步。郡出土《竹书纪年》等多种先秦古籍，记载的史事与儒学典籍及《史记》等行世的史书，了人们对古史的考辩。

《晋书》卷八十二《司马彪传》载：“初，谯周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不专据正经。周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彪复以周为未尽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多据《汲冢纪年》之义，亦行于世。”

《古史考》其书久佚，但据现存遗文，在“採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方面比无不及，顾颉刚先生指出：谯周《古史考》“广搜博采，以多为胜，不问神话传说产生编入古史系统，把古史系统上溯至燧人、包羲，开了唐、宋以后编古史者广采杂家小说”[10]但是谯周既然“以纠迁之谬误”为宗旨，《古史考》必然包括大量历史考证性的内史资料，本身即具有考证的性能，至于抉择和判断的眼光、见识，则另当别论。司马彪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多据《汲冢纪年》之义”，则其著述应是历史考据性专著，可惜传。

据《隋书·经籍志》著录，晋刘宝撰有《汉书驳议》二卷，南朝姚察撰有《定汉书》佚失不传，无考其详，但依书名判断，很可能是考史专著。东晋孙盛《异同评》是一部作，内容是比较不同的记载，加以鉴别，确立一种较为可信的说法。其中颇具精密的历策遇刺事件的考证，对比了《三国志》、《江表传》、《九州春秋》的不同记述，指出孙策欲乘袁、曹官渡之战袭击许昌时遇刺，与同书记述的官渡之战时间冲突，而《江表传》攻广陵之时，确有依据。《九州春秋》所记时间与事件，则已是孙策死后七年，“乖谬种综合考析，将纷杂的记载层层剖析，引证资料予以辩正，显示了高超的考据方法。此《阳秋》这部编年体史书的副产品，与七百年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性质全同。因

朝众多史家对史书编纂多方向探讨的氛围下，有专门的历史考据性专著超前地出现。而前，未引起广泛关注和护惜，终而佚失不存。

散存于其他各种著述家的历史考证、文献辨伪，也从两汉时期的原有水平上有所提。《三国志注》有不少历史考据的内容，对于陈寿《三国志》记载官渡之战前曹操“兵不满万，曹操军事力量的发展状况及当时会战的情节，提出了三条理据，令人信服地指出操兵[12]在考订蜀汉后主刘禅生年、身世与继帝位年纪时，裴松之引证《三国志·蜀志》的主妃子传》以及《诸葛亮集》等史料，梳理刘禅的经历，反驳鱼豢《魏略》将刘禅记述备离散，被人所买等等异说，指出这样竟使刘禅年龄增多十几岁，与所有可靠史料冲突不得然，此则《魏略》之妄说乃至二百余言，异也！”[13]这些史事考证缜密、严谨，色。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对各种史书作了辨伪性考据，如认为孔子作《春秋》传》，皆存在着疑点，表现出很高的学识和求实精神。此外，郭璞《山海经注》、裴骃都含有历史考据，郦道元《水经注》则多有历史地理的考证。刘昫对郑玄关于宗庙祭器议，随后，他的见解因实物出土而得到证实。[14]所有这类事例，都表明魏晋六朝时期和广度皆有引人注目的发展。

### （三）隋唐五代时期的历史考据

隋唐五代时期，历史考据方法承接魏晋六朝，但却主要作为其他著述撰写中的附带短，五代时期政权割据，学术文化皆逊于唐代。唐初官方令孔颖达等编辑《五经正义》历史考据，如指出《左传》后来有增竄，《谷梁传》是“汉初始作”等等。唐代司马贞守节《史记正义》、颜师古《汉书注》等，均有不少历史考据性内容。所有这些，均未据水平。

唐代历史考据水平的代表者当推史学家刘知幾和《春秋》学家啖助及其弟子赵匡。著作《史通》，其中《疑古》篇对上古史事进行了许多考辩，有些论断引《竹书纪年》说的尧、舜、禹禅让，认为所谓舜的“南巡”死于苍梧，乃是被禹流放，可见禹乃是夺样的疑辩，连续提出十多项，将儒学的上古史体系大半颠覆，并且总结说：“推此而言妄甚矣。”[15]其他如《汉书五行志错误》、《汉书五行志杂驳》等篇，也多有史事的于《孝经》、《易传》等等书籍文献的考订之文，今存于《全唐文》内。刘知幾的主要面，所发议论惊世骇俗，在中国思想史上大放异彩，而同时具有历史考证上的成就，足维，对于历史考据同样重要。

啖助、赵匡对《左传》的研究在经学、史学上都颇开生面，啖助指出《左传》成书后代学者系以年月并且加入许多杂乱素材而写就。这虽然仍很笼统，但在《左传》作者了坚冰。赵匡正是在此基础上使认识得出一大飞跃，明确指出《左传》非左丘明所撰，以为《春秋左氏传》是丘明所为……编之《七略》，班固因而不革，后世遂以为真。所不返者也。”[16]受啖、赵一派学术的影响，柳宗元对先秦诸子的考辩亦成就显著，影裴矩《西域图志》、唐《元和郡县图志》等地理书，在地理考释上有一定意义。

唐代的历史考据，不能说比魏晋六朝毫无进步，考订疑及经传，意义颇大。但其意念方面，刘知幾以考辩辅助其理论论述，啖、赵诸人的学术也主要在于阐释经义，他们性质的专书。整个隋唐五代，缺乏将考据视为相对独立学问的治学意识，因此盛唐文化史学、私家史学均有重大发展，刘知幾的史学理论更是辉映千古，但没有出现历史考据这一点上反而不及两晋六朝时期，致使历史考据学仍未能以相对独立的面貌产生。

## 三、中国历史考据学的成立和发展

## （一）两宋时期中国历史考据学的成立

宋朝是中国学术文化的迅速发展的时期，经学、史学、文学皆出现了许多新的气象论思维与思辨精神带来学术思想上的空前活跃。在经学和史学上，疑古精神发扬光大，“新进后生，……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书》。”[17]司马光的本意当然是对这种现象不满，希望予以纠正，但恰可从中可看出学古思潮，这给考据学的发展以很大的推动力。

首先是辨伪活动的勃然发展，开其风者是欧阳修，他考辨著述宏富，涉及广泛，对《礼》、《易》、《春秋》等经典及传注概有怀疑，或认为非圣人之作，或认为已经残貌。理学家程颐也认为《周礼》“讹缺甚多”，《礼记》中《儒行》、《经解》“非孔非丘明之作”。王安石、苏轼等学者也均有文献辨伪的考订著述，[18]这些北宋的学典都可怀疑，酿成风气，影响深远，使宋代大量学者步入文献辨伪、史事考据、正误订，使对疑古风气不满的司马光，也撰有《疑孟》之文，对《孟子》中记述的史事，予以考

宋代对古文尚书的辨伪成绩最值得注意，西汉初有伏生所传二十八篇今文尚书，史《古文尚书》，比今文多十六篇，西晋末年战乱中一起佚失。东晋初年梅赜进献《尚书》在内，且有孔安国的《尚书传》。学术界并未疑其伪，唐代孔颖达等奉旨编撰《五经正献本的《尚书》及孔传，颁于学官，成为政府科举考试的依据。中唐以后，李汉等个别到《尚书》中杂有不可信的篇目，但未进行具体的辨伪考证。至宋朝才开始了具体辨伪，棫著《书裨传》，提出了古文尚书不可信的问题，因为古文尚书文通字顺，不同于先秦《今文尚书》则文字古奥难解。朱熹在吴棫的启发下，从文辞、文风、来历等方面对《今文古奥难读，古文文通字顺，为何伏生单单记住难读的？简易者如何全然不记得？至“《尚书》决非孔安国所注”，因其文不像西汉文风，而且晋代之前也无记载可证。这书》和伪孔传的要害。

宋代出现了大量史考专著，这是历史考据发展上最重要进展。北宋有司马光的《资东晋孙盛《异同评》，而开启著书、治史之流行新法。北宋吴缜著《新唐书纠缪》、《专们针对欧阳修主修的两种史书，指摘、考辨其记载失实、失当之处。《新唐书纠缪》八失，其中也有义例得失问题而不属于史实纠误，但全书大多仍是考其史实之误。《五欧氏《新五代史》其彼此间抵牾舛误之处有两百多处。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史》义存褒贬，而考证则往往疏舛……缜一一抉其缺误，无不疏通剖析，切中症结，故[19]

而在吴缜之前，北宋即已兴起历史考证性质的专书，如余靖撰有《汉书刊误》，参著有《东汉刊误》、《西汉刊误》，这些著述主要内容是刊正误字、误句者，是以校勘证。南宋时有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十卷，《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引据赅洽，考证务使明白无疑而后已”。[20]清四库馆予以这样高的评价，在同类史籍的提要中颇为少

宋代史考专书与以历史考据为主体的史著大为兴旺，从隋唐五代的寥落荒原转变成据意识深入史学领域，许多史著都经过充分稽考成书的，如宋高宗时邓名世《辩论谱说辨证》，前一书佚失而内容已经不详，但《玉海》评论为其“辨先儒言经传之失，考订《西汉决疑》有《失实》、《引古》、《异言》、《杂证》、《注释》五篇，除部分注内容是考据性的。洪迈《容斋随笔》及后续各书，实际是以考述史事、考释文献为其核心上也十分成熟。此外，南宋陈大昌有《考古编》、叶大庆有《考古质疑》、史绳祖《学是立足于考据而著述，有名的理学家魏了翁也撰写《古今考》，意欲考订汉代的典制。著名学者，学术根基定于宋代，著述丰硕，于历史考据创树尤多。《困学记闻》内有《有专题历史考据之文《汉河渠考》、《历代田制考》、《历代漕运考》、《两汉崇儒考有《诗地理考》五卷、《汉书艺文志考证》十卷、《通鉴地理考》一百卷、《春秋三传《通鉴地理通释》十六卷、《汉制考》四卷等多种考据专著，[23]均达到很高的学术水佚失，未能完全留存至今。王应麟可称为宋末考据学大家，为历史考据学的发展作出重

南宋李心传《旧闻证误》是又一历史考辨专书，内容以北宋史事为多，亦下延于南小说，上至朝廷制度沿革，下及岁月之参差，名姓之错互，皆一一详征博引，以折衷其

光之《通鉴考异》，而先列旧文，次为驳正，条分缕析，其体例则如《孔丛》之《诂墨舛，于史学深为有裨。”[24]宋孝宗时李大性所著《典故辨疑》更值得注意，《宋史·李大性传》记载曰：“《典故辨疑》百篇，皆本朝故实，盖网罗百氏野史，订以《日历》正舛，率有据依。”《文献通考》录其自序称：“私史荐兴，说令蠹午，朱紫苗莠，混美，未免蒙翳。……臣大惧私史踏驳，或为正史之蠹，辄撷其事而正之。……独取熙朝夫之卓之可称而其事为野史、语录所翳者，辩而明之，参其岁月，质其名氏、爵位而考词，难以示信，以意逆志，虽知其非而未有晓然依据，则姑置弗辩。其有所辩者，必得焉。所辩凡两百条，厘为二十卷，名之曰《典故辨疑》”[25]

总之，宋代是历史考据学的发展，出现了显著区别于前代的标志性的成就：第影响下，历史文献的辨伪勃然兴盛。

第二，大量历史考据专书行世，构成历史考据学的学术规模，给后代的史学发展以令历史考据学得以确立而不再萎缩、后退。

第三，治史的考据意识增强，对历史考据初步出现理性的认识与概括，这是宋代历史“学”的重要因素之一。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之独立作为一书，将考订成果相对地考据意识增强的体现。大量历史考据专书的撰写，巩固与光大了将考据作为一种专门学地认识与概括历史考据的原则及宗旨，可以北宋吴缜、南宋李大性的见解为代表。吴缜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缺焉，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不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述将“事得其实”置于史学的首位，即是历史考据的理论基础。上引李大性《典故辨疑》或传闻异词，难以示信，以意逆志，虽知其非而未有晓然依据，则姑置弗辩。其所辩者之说焉。”提出历史考据“必得所证而后为之说”，道出了历史考据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历史考据，必须以征引确切证据为论断的根据。

这三点标志性成就，表明宋代的历史考据与此前相比发展到性质不同的阶段，即中形成与建立的阶段。从此，历史考据学具有持续发展的学术基础和社会机制，在一般的现整体衰退的倾向。

## （二）元明两代历史考据学的进展

元朝史学整体上不及宋代繁荣，但承接宋代余绪，仍出现不少专门的专著。王应麟《释》和《汉制考》两部专著，实际完成于元朝初年。[27]宋魏了翁撰有《古今考》，但成。元朝方回则续纂其书，撰成《续古今考》三十七卷，本书依照魏氏体例，仅以《汉线索，考证古代之典故、名物，如高祖斩蛇条下，则考剑，范增举玉玦条下，则作玉佩。考制度有别。胡三省《资治通鉴释文辨误》对南宋史炤《通鉴释文》予以驳正。黄镇成释《尚书》为线索，“征引旧说，以考四代之名物典章，亦间附以论断，颇为详备”。考》是一特殊著述，考述元代纸币沿革变化与相关国计民生问题，可补《元史·食货志》。《文献通考》虽非专门历史考据之书，而在勾稽文献史料上功力甚大。元朝末年黄潜的实际是分条目的考据著述，《四库全书总目》称其“书中皆考证经、史、子、集异同得则，尤精於辨经。……引据尤极明确，非束书不观而空谈臆断者也。”总之元代考据学多，但从元初至元末，专门考据之书可谓不绝如缕，承接了宋代成果，并且出现《宝钞》著述。

明代学术表现丰富多彩，同时也驳杂冗滥，学人撰述书史，作多方向探求，各方面量上的大发展，许多现象类似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其中历史考据专书数量甚多，但学术《史乘考误》，胡应麟《四部正讹》为其中佼佼者。历史考据在明代的发展，主要趋势有据的考证原则而进一步严谨精深，而是开辟一块新的境地，即撰写钩稽史料，以考述。这类著述无论实际功力如何，往往在书名中就标识有“考”字。姑且随手从《明史全书总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目录中抄略若干书名以示其概况：

历史地理与域外史地方面：张久复《皇輿考》，陆应阳《广輿考》，卢传印《职方西洋考》，李言恭《日本考》，茅瑞徵《东夷考略》，郭光复《倭情考略》等等。

社会文化与学术方面：王琯《历代经籍考》，凌瀚《古今群书类考》，程良儒《读《群书备考》，周祈《名义考》，慎懋官《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耿随朝《名物类考礼乐考》，董其昌《学科考略》等等。

古今历代人物方面：戴庭槐《孔门源流考》，朱常涝《古今宗藩懿行考》，冯从吾《梦熊《历代相业考》，王兆云《皇明词林人物考》，俞宪《皇明进士登科考》，过庭训考》，顾祖训《状元图考》，李腾芳《宦寺考》等等。

历代政治、经济及典章制度方面：胡彦《茶马类考》，吴山《治河通考》，王宗沐汝璧《功臣封爵考》，张朝瑞《皇明贡举考》，程敏政《宋纪受终考》，王在晋《历代《历朝经济考》，王圻《谥法通考》，朱常沔《改元考》，王圻《东吴水利考》等等。

边防、军事方面：何鏜《修攘通考》，魏焕《九边考》，茅瑞徵《万历三大征考》功纪胜通考》，史继偕《皇明兵制考》，侯继高《全浙兵制考》，张雨《全陕边政考》。

以上所举，仅仅是同类之书的一小部分而已。其共同特点是勾稽史料而集中考述某名皆用“考”字。书名带有“考”字的著述，当然并不一定做到考据精深与史料周密，以“考”用于书名的现象，反映出考据之学被整个社会认可、尊崇，成为学术界内典雅象。尽管此类书史中有些仅仅是粗略纂辑之作，但同时也不乏具有历史考据的功力的著述。这是历史考据专著的一种新的体式，在宋代尚未产生，元代则仅有武祺的《宝钞通考》籍的涌现，造成一种声势，从而确立其占有历史考据学内的一席之地，拉近了历史考据述的距离。影响至于近代，近代许多著名学者的历史考据专著，如陈垣《元也里可温教了这种撰写方式。

明代社会伪书泛滥，同时辨伪之学也日益深化。著名文献学家胡应麟总结了八条辨性的指导意义：1，覆之七略以观其源，2，核之群志以观其绪，3，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言之言以观其述，5，核之文以观其体，6，核之事以观其时，7，核之撰者以观其託，8，人。文献辨伪是历史考据的一项组成部分，胡应麟的辨伪学理论对历史考据学的发展作

### （三）清代历史考据学的兴旺

清朝的考据学摒弃了明人轻率粗糙，承袭了明人多方向考史探讨的成果，从清初就发展的局面。顾炎武《日知录》中多有考史内容，为精湛的考据名著，对治学风气向追深方向的转变作出了榜样。康熙年间，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以充分的证据考定《古大振考据学声威。胡渭《易图明辨》将围绕《周易》的所谓“太极”、“先天”、“后图”、“洛书”之类予以总的清扫，揭发其不光彩的来源。同时，承接明朝开拓的考据汇为一考，弄清某一方面历史内容的专书仍大量涌现，如王世贞《国朝谥法考》、黄琳宗羲《历代甲子考》、万斯同《历代宰辅汇考》等等。

至乾嘉时，历史考据著述随着整个考据学的兴盛也一起进入到了鼎盛时期。几乎所乾嘉时，涌现许多历史考据大家、名著，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廿二史考录》等。再如梁玉绳《史记志疑》、《汉书人表考》、钱大昭《汉书辨疑》、沈钦韩《等，亦为精致的史考之书。乾嘉之后，史考之书从未断线，一直发展。值得注意的是除记之外，专题史考论文则在清人文集中不可胜计，是历史考据学蓬勃发展的又一迹象。

清人在考据学上有了进一步的理论性认识，钱大昕等倡导治学的实事求是原则，认自实事求是始”。[29]王鸣盛则明确提出：“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而已矣，此外又何多求耶！”[30]崔事记载致误得原因进行了比较全面得分析，又对历史考据得原则进行很有条理的总结，《录》，于汉晋诸儒之说，必为考其原本，辨其是非，非敢诋謫先儒，正欲平心以求一是信录》，凡无从考证者，辄以不知置之，宁缺所疑，不敢妄言以惑世也”。[31]此类申学方法论的意义，为乾嘉考据学派理论上的重要建树。

乾嘉之后，主流学风逐步嬗变，但考据学经过乾嘉时期的兴盛辉煌，已经拥有继续力量，即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学科系统。晚清历史考据著述仍然层出不穷，何秋涛《朔方容，实际是由一系列专题考据组成，如《北徼界碑考》、《北徼条例考》、《俄罗斯馆

考》、《北徼喀伦考》、《考订使俄罗斯行程录》……等等。直至清季，不乏具备很高造诣，如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洪钧《元史译文证补》等。也出现了孙诒让、王先谦的历史考据学家。

在近代中国，由于民族危机的深重与社会矛盾的激烈，史学经世的传统更为光大，政治立场，甚至直接加入到某一政治派系。在这种局面下，历史考据学仍然取得辉煌的一页，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和西方史学方法的输入，给中国史学带来新的生机。史家思想的开阔，导致对历史问题的新的发现。研究方法的更新，特别是西方考古学的传入，增广了考据的素材与手段。第二，大量新史料的发现与发掘利用，特别是甲骨卜辞的出土、青铜器铭文和汉晋简牍的发现、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为历史考据开辟了巨大的学术空间下，投身历史考据的学者众多，成就显著，形成学界所谓的新历史考据学派。王国维、郭沫若等几位史学家，分别取得近代历史考据学在各个方面的代表性成就。

王国维在学术上受西方思想与治学方法的很大影响，他运用甲骨卜辞与金文史料，取得重大成就，并且总结出具有近代学术性质的考据方法，即“二重证据法”，其核心是与文献记载对照考订，是西方史学方法结合了中国实际条件的应用。王国维的史学成就重新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意义巨大。

顾颉刚及其古史辨派从疑古的观念出发，提出“层垒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命题，应予以认识，溯本求源进行历史文献的辨伪，将缺乏确切依据的上古传说排除于信史之外，颠覆了“三皇五帝”古史体系，为新史学的建设清扫基地，具有莫大的思想解放和学术启迪作用。这种学术与日本近代史学影响下产生的。

陈垣在文献学的坚实基础上，建立其历史考据的宏伟大厦，其治学路径是传统考据学的大发展。他的代表性成名作《元也里可温教考》、《元西域人华化考》等等，皆为明代以来一历史专题的著述方式，但历史专题的选定，则反映了站在时代思想前沿的特色，非明末清初考据学可比。郭沫若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在辨识甲骨文、金文以及阐释其蕴含的历史内容方面取得卓越的成就。同样，对其他历史资料的解读也卓有过人的独到之处，证明了新思想方法的成就，是他对于古代社会史研究的根基。另一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尹达，依照郭沫若的古史辨派的造旨，考述中国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历史，取得令国际学界刮目相看的成果。

综上所述，自宋代历史考据学建立以来，历史考据持续发展，在历史学内蔚成一片繁荣的园地，不仅学术价值有目共睹，其社会功能也得以积极发挥。

#### 四、历史考据学的学术价值与地位

纵观中国历史考据学的发展历程，应当正确认识它在史学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考据为所有历史认识的根本基础。**在历史研究中，任何深度的历史认识，都必须以历史考据起到判断史事是否真实的作用。如果缺乏这一基础，所有历史分析、历史理论、历史高谈阔论都不堪一击。

**二、开拓历史研究新领域的先锋作用。**现代历史学研究领域的开拓，无论是扩大时区，还是探讨新的历时内容，都必须首先明了相应的人物、事件等基本史实，这就必须订正。因此对于整个史学界而言，新时段、新区域、新内容、新题材的历史研究，总是要以订正史实为阵，不考订史实的基本状况，任何研究都无法着手进行。这是显明的道理。

**三、更新历史认识的枢纽作用。**在思想范式更新之际，历史认识也随之发生宏观和微观的更新，不能单单纯视为新理论的作用，因为历史学具有以史实为基础的特殊性质。在宏观历史认识更新之际，要进行新的历史考订，从而为新的历史观提供证据。近代维新派的历史观，是通过对中国历史和宣传，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日本变政考》是为典型之作。

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得力于郭沫若等史学家的历史考述，解放后史学“五朵金花”的讨史实的考订。总之，历史考据在更新宏观历史认识的进程中，起到不可或缺的枢纽作用

**四、引领史学的发展走向强化学术性的途径。**历史考据比史学研究的其它方式具有更多较少受学术外因素的干扰。同时，历史考据又有引领整个史学强化其学术因素的作用。问题上本多禁忌，而考据学的兴盛则促使乾隆朝的后期承认其先祖受封于明朝，承认南地位。同时，官方纂修了《西域图志》等一批颇具学术价值的史书，考订与更正官修《误。大抵越全面、越深入的历史考据，越能够有效地排除对历史的有意隐瞒和曲解，使的道路上健康发展。这一点，是使历史考据学具有最可宝贵、最富于发展前途的价值。

- 
- [1]（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第六，《僖公二十六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8月，后同）
- [2]（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第十，《宣公二年》。
- [3]（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第十七，襄公二十五年。
- [4]《论语·子张》第十九。载（朱熹《论语集注》卷第十）
- [5]《孟子·尽心下》。（朱熹《论语集注》卷第十四）
- [6]《韩非子》卷十九，《显学》。
- [7]《史记》卷十三，《三代世表序》。
- [8]（唐）孔颖达《礼记正义·月令》引郑玄《三礼目录》。
- [9] 唐）孔颖达《尚书正义·泰誓》马融《书序》。
- [10]顾颉刚：《崔东壁遗书序》，载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6月出版）
- [11]（清）严可钧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六十四，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1842页。
- [12]《三国志·魏志》卷一，裴松之注。
- [13]《三国志·蜀志》卷三，裴松之注。
- [14]《梁书》卷五十，《文学下·刘杳传》。
- [15]《史通》卷十三，外篇《疑古》。
- [16]（唐）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卷一，《赵氏损益义》第五。
- [17]《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四十五，《论风俗劄子》。
- [18]参见顾颉刚：《崔东壁遗书序》，载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卷首P. 42~44，此处不备举。
- [19]《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史部“正史类二”。
- [20]《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五，史部“正史类一”。
- [21]王应麟《玉海》卷四十，“艺文”。
- [22]载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六《考史》。
- [23]见《宋史》卷四三八《王应麟传》，《宋史》卷二〇二《艺文志·春秋类》。
- [24]《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八，史部“史评类”。
- [25]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经籍考》二十七史部“史评史抄类”
- [26]吴缙：《新唐书纠谬序》，载《新唐书纠谬》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7]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三册（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引钱大昕《王伯厚年谱》，考订《通鉴地理至元十七年八月，《汉制考》成书于至元十八年五月。
- [28]《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经部“书类二”。
- [29]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五，《卢氏群书拾遗序》。
- [30]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首，《自序》。
- [31]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释例》。载《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6月）P. 2~14。

- 
- 上一篇文章： 谢保成：两部《唐书》的取材与思想
  - 下一篇文章： 赵庆云：论金毓黻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

[【发表评论】](#) [【告诉好友】](#)

#### 最新5篇热门文章

- [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在京召开\[161\]](#)
- [中共为何能在1949获胜:当年美远...\[91\]](#)
- [访问记: 余英时谈好友唐德刚\[98\]](#)
- [黄现璠先生简历和著述编年目录...\[426\]](#)
- [唐德刚先生逝世\[231\]](#)

#### 最新5篇推荐文章

- [《史学研究网》寄语\[5556\]](#)

没有相关文章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没有任何评论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站长](#) | [友情链接](#) | [管理登录](#) |

2004-2007版权所有: 史学研究网